

十三轍、民謠用韻與上古漢語韻部元音構擬的原則

馬毛朋

南京大學中文系/嶺南大學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

一

上古漢語韻基部位元音的構擬工作面對的首要問題是是否為上古的同一韻部構擬同一個主元音，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不同的立場就會形成大相逕庭的韻母系統的構擬。

高本漢(1957)、¹董同龢(1944)²的構擬中一個韻部都有幾個主元音。這樣構擬主要是出於語音系統的考慮，用不同元音來分等。王力(1956)、³李方桂(1971)⁴則堅持一個韻部只有一個主元音。俞敏先生為一個韻部不一定只有一個主元音的構擬提供了詩歌押韻的證據。俞先生說：「凡是假定『一部只許有一個元音』，「在一塊兒押韻的元音准一樣」這類理論的，都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的。……最好的藥方兒是找民間藝人學習。」⁵俞先生舉出民間藝人押韻的「十三轍」，認為一塊兒押韻的並不一定是一個相同的主元音。鄭張尚芳(2003)也支持此說，認為「韻部實際上是上古韻文的韻轍(rhyme)」，「在一、四等並存的收舌、收唇(包括收-w)各部，則每部實含二至三個元音」。⁶

拿鄭張先生的擬音來說，我們把他的構擬應用到《詩經》當中，馬上就發現一些「奇特」的用韻現象。比如下面這首《陳風·月出》：

月出皎兮(keew?)

佼人僚兮(reew)

舒窈糾兮(kw w)

1 中譯文見潘悟雲等譯：《漢文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2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4年。

3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4 見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5 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載俞敏：《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24。

6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56-57。

勞心悄悄兮 (shew?)

學者們一般認為，這首詩中，霄部(皎、僚、悄)和幽部(糾)合韻。依上面的擬音，霄部三字主元音有長短之別，韻尾有有無?之別，與幽部字糾之間，更是主元音不同，霄部字 e，糾是 u，一為前元音，一為後元音，韻尾也不同，糾是開音節，皎、悄都有喉塞音尾。按照這種擬音就出現了主元音和韻尾都不相同的字在一起押韻的情況。類似這樣「不和諧」的韻例還很多。用這樣的擬音來理解《詩經》用韻，給人的感覺是《詩經》竟然是如此的「佶屈聱牙」。

何九盈(2002)指出韻部不是韻轍，十三轍來源複雜，與《詩經》韻部沒有可比性。

⁷ 關於十三轍，何先生尚未詳述。本文即嘗試順著何先生的思路，展開對十三轍性質的討論。同時，我們以為，語言類型學可以提供給我們評價一種假說的框架，在類型學上非常少見或沒有出現的假設常常是不合理的。就上古音韻部元音的構擬來說，那種使得《詩經》中產生大量「奇怪」用韻現象的構擬，其合理性自然是讓人懷疑的。為此本文亦考察了現實中民間歌謠的押韻現象，總結其押韻的普遍類型，為上古時期漢語的押韻規則提供一個參照。

二

十三轍是俞敏、鄭張尚芳等先生認為上古漢語時期的《詩經》同一韻部可以構擬不同主要元音的根據。

北方民間曲藝用韻的韻腳，叫「輒口」或「輒兒」。在民間曲藝形成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相沿成習的「十三轍」。不過，直到張洵如先生1937年的《北平音系十三轍》和羅常培先生1942年的《北京俗曲百種摘韻》才系統的歸納出了十三轍各轍的韻字。張、羅二先生書中每轍包括的韻母相同。^{8、9} 薛鳳生先生《國語音系解析》也詳細分析了十三轍。¹⁰ 下面是羅、薛兩家十三轍的擬音，羅先生原用拼音標音，此處改為國際音標，下面只列出與我們討論有關的各轍的主元音和韻尾：

	發花	梭波	乜斜	一七	姑蘇	懷來	灰堆	遙條	油求	言前	人辰	江陽	中東
羅	a	oə	e	iyll	u	ai	əi	au	əu	an	ən ¹¹	aŋ	əŋ ¹²
薛	a	ə	ə	i	i	ay	iy	aw	iw	an	in	aŋ	iŋ

7 何九盈：〈上古元音構擬問題〉，載《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23-33。

8 張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轍》，臺北：天一出版社，1973年。

9 羅常培：《北京俗曲百種摘韻》，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10 薛鳳生：《國語音系解析》，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

薛先生的音標是按嚴格的音位原則分析的結果，每轍中的韻字主要元音和韻尾都相同。但從聽感來說，i、ɿ、y、ɿ的差別還是明顯的。我們暫以羅先生的標音作為討論的基礎。

從上表羅先生的標音可以看出，十三轍在語音上的表現是：一轍中，在一起押韻的字韻尾一定相同；主元音則是除了梭波轍和一七轍外，其他各轍都相同。

就韻尾來說，或許還有些例外，因為俗曲中，有中東轍和人辰轍混用的例子，不過羅先生已經解決了這一問題，他指出，這是方言色彩的表現，實際上，-n尾和-ŋ尾的字是不混押的。¹³

再來討論梭波轍和一七轍，梭波轍，特別是一七轍，其主元音在聽感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那麼這算是和諧的押韻嗎？是否俗曲藝人就是覺得這些不同主元音聽起來也算是押韻，也就可以在一起押韻呢？只有考察十三轍形成的過程，才能把這個問題弄明白。

中國戲曲發展的過程中，有一種獨特的現象，即由於戲曲流行的區域和各地方言的不同，戲曲採取了與地域方言相應的音樂曲調演唱，這就形成了多種戲曲聲腔和劇種，戲曲發展的過程就體現為聲腔劇種不斷演變和轉化的過程。¹⁴ 十三轍就是在這種聲腔劇種演變和轉化的過程中形成的。

清代初期，花部聲腔興起，十三轍成為梆子、皮黃聲腔系統的劇種普遍遵守的押韻標準。而梆子、皮黃聲腔的形成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中國成熟的戲曲形成之初，即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聲腔流派，南曲戲文和北曲雜劇。南曲戲文產生於十二世紀初吳方言區的溫州，北曲雜劇產生於十二至十三世紀北方方言區的山西、河北一帶。由於產生地方言及民間曲調風格的差異，南曲、北曲形成了不同的音樂系統。在後代的發展中，南曲產生了十五種變體，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杭州腔、樂平腔、徽州腔、青陽腔（池州調）、太平腔、義烏腔、潮腔、泉腔、四平腔、石台腔、調腔。其中徽州腔屬於徽語方言區，潮腔和泉腔屬於閩南語方言區，其他屬於吳語區。我們看到，這種聲腔的分化演變總是以各地方言為基礎的，一種聲腔到了一個新的方言地區，總是產生出新的聲腔變體。明代萬曆年間，在南曲的攻勢下，北曲雜劇瀕於消亡。隨後在北方民間俗曲發展交融的過程中，又產生了新的聲腔系統，即弦索腔和西秦腔。弦索腔是在北方各地俗曲小令的基礎上形成的，其包括的劇種大都是北方民間各地的小劇種。弦索腔在各地又繁衍出了河南女兒腔、山東姑娘腔、柳子腔、羅羅腔等劇種。西秦腔起源於隴西

11 原文拼音例字是「恩分」「音因」「溫吞」「君軍」，寫作國際音標是 ən, iən, uən, yən。

12 原文拼音例字是「鏽崩」「應英」「翁東」「胸兄」，寫作國際音標是 əŋ, iəŋ, uəŋ, yəŋ。

13 羅常培：《北京俗曲百種摘韻》，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3。

14 廖奔：《中國戲曲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40。

一帶的西調。西秦腔亦即秦腔。清初，秦腔傳遍全國，向南一路傳到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省；向北傳到山西、河南、山東、河北、北京。形成了梆子聲腔系統的眾多劇種（秦腔用梆子擊節，故稱梆子腔）。長江沿岸的湖北、安徽、江蘇一帶是南北聲腔交匯之地。交匯的南北聲腔在這裡又形成了吹腔系的樅陽、襄陽腔。樅陽、襄陽腔脫胎於秦腔，又不斷與秦腔融合，又產生了新的腔調：二黃和西皮，二黃和西皮又復合成皮黃腔。皮黃腔隨著徽班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京為清高宗祝八十大壽，進入北京地區，這直接促成了京劇的形成。

我們看到梆子、皮黃聲腔的形成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是不同的聲腔相互交融碰撞，不斷地與廣大的北方方言區的民間腔調融合的產物。

通過上面對梆子、皮黃聲腔系統劇種的形成過程的分析，就我們討論的十三轍，我們可以總結出這樣兩點：第一、由於梆子、皮黃腔基本是在北方方言區形成的，其語音基礎是北方方言，正是北方方言語音系統上的「大同」，才可能使得在廣闊的北方地區輾轉形成的梆子、皮黃聲腔系統的諸種戲曲有一個普遍遵守的十三轍用韻系統。第二、羅常培先生指出這樣一個現象，「十三轍的演成，已然經過六百多年的歷史了。不過，現在北方流行的十三轍是有目無書的。究竟那些字應該屬於那一轍，並沒有成書可供檢尋」。¹⁵ 六百年間，十三轍只有「發花」「梭波」等空的名目，而每個名目之下沒有具體的字，這不非常奇怪嗎？通過上面的戲曲史的考察，我們知道，十三轍只能是一個空的名目，因為北方各方言還有它們的「小異」，這些「小異」使得實際上各地戲曲都按照各地的方言為十三轍各個名目填上在本方言中押韻的字。這一點，張洵如先生《說轍兒》也表達了相近的意思：「這樣看來，十三道轍乃是一個普遍的近代語音韻類的分部大綱了。各地的增減分合都是為了方域的限制。」¹⁶ 現在我們見到的既有名目又有具體韻字的十三轍，都是後人歸納戲文韻腳字得到的，如張、羅先生的著作、京劇十三轍等等。這些戲文同戲曲一樣，在各地輾轉流傳，根據這些戲文歸納出的十三轍，就出現了一七轍、梭波轍這些包含不同主元音的轍。這樣的轍算是押韻嗎？算是和諧嗎？京劇上口字的說法，對我們認識這一問題很有啟示。下面京劇的例子引自何佩森（2004）。¹⁷

按照上口字的說法，京劇一七轍中今讀 l 、 λ 韻母的字，要讀成 i 韻母。拿 λ 韻母的字來說，如：京劇《武家坡》薛平貴〔西皮流水板〕唱詞：

洞賓曾把牡丹戲，莊子也曾三戲妻。

15 羅常培：《北京俗曲百種摘韻》，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6。

16 張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轍》，臺北：天一出版社，1973年，頁33。

17 何佩森：《梨園聲韻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秋胡戲耍羅敷女，薛平貴調戲自己妻。

弓插袋內假摸取，我把大嫂的書信失。

《銚期》中[二黃散板]唱詞：

難得爾等全忠義，留下美名萬古題。

二堂之上忙綁起，一家大小甚慘淒。

悲悲切切金殿去，有罪之臣叩丹墀。

《探地穴》中柴郡主上場念的「對兒」：

夫妻定巧計，神人也不知。

《鳳還巢》中程夫人與朱煥然的[西皮搖板]：

悔恨錯嫁親生女，但願混碗飽飯吃。

「失」「墀」「知」「吃」韻母不讀 ɿ 而讀 i，與前面的韻腳 i 押韻。這樣上口之後，一七轍實際上只剩下了 i 和 y 兩個主元音。不過何佩森先生已經指出，i 和 y 相押是很罕見的現象。¹⁸

梭波轍的上口讀法中，一部分字，如「哥」「科」「可」「和」等主元音是 ə，韻母的要改讀為 uo，這樣就與 o 主元音相同了；另一部份字，如「者」「車」「奢」「熱」等改讀成與乜斜轍同主元音。

這樣一改讀上口，實際上，京劇用的十三轍中每轍的字主元音和韻尾基本上都相同了。為甚麼要把這些字改讀為上口字呢？何先生說的很明白：「只有上口才能合轍押韻。」¹⁹

「上口字」問題給我們以重要的提示，這種在廣大北方方言區形成的包含不同主元音的韻轍，在實際的戲曲表演中，被認為是不押韻的，於是人們就想出一些辦法讓不同的主元音變得相同，就是要讀成上口字。可見人們還是認為同一主元音的字在一起才算得上和諧上口。

總結一下關於十三轍的討論，十三轍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它是在梆子、皮黃聲腔形成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它以廣大的北方方言為方言基礎，由於北方方言間的差異，使得根據戲文韻腳歸納出的十三轍出現了包括不同主元音的韻轍。這是由十三轍這種綜合的性質決定的。十三轍的這種綜合性自然和《詩經》中的詩歌用韻沒有可比性。也自然不能看到十三轍中有包含不同主元音的韻轍就認為上古《詩經》的同一韻部可以有不同的主元音。同時，通過分析上口字現象，我們發現，在真正的戲曲實踐中的十三轍是一個每轍中基本都包含相同主元音和韻尾的押韻系統。可以說，人們還是以為主元音和韻

18 何佩森：《梨園聲韻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254。

尾都相同才能押韻。

三

實際上，和《詩經》用韻性質最相近的並不是曲韻十三轍，而是當代民間歌謠的用韻。我國民間有非常豐富的俚俗歌謠，這些歌謠或代代相傳或產生不久，但大都是有韻之文。這些歌謠從民間產生，在民間流傳，其押韻當是最自然的。在歌謠的性質上，其和《詩經》中「國風」的性質是一致的。歸納分析當代民謠的用韻情況，對我們認識《詩經》的用韻方式有獨特的參考價值。

關於民間歌謠的詩律、用韻的研究，已有民間文學學者做了這方面的工作。如段寶林、過偉先生主編的《民間詩律》中就有十多篇相關的文章。²⁰ 這些學者文章中談到的句末韻腳就是指主元音和韻尾相同在一起押韻的字。對韻腳的這一理解表明，這些學者在討論民歌用韻時，是把句末位置主元音或韻尾不同的字處理為不入韻的。

為了更全面的討論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直接面對民間歌謠。這些各地的民間歌謠，已有很多民俗學者進行了搜集和整理。可是大都是用文字記錄下這些歌謠而已，沒有標音，因而我們可資參考的材料並不太多，只有方言志的「標音舉例」部分用國際音標紀錄下的一些民間歌謠。我們的研究也主要依據這些材料。我們共分析了各地民謠530個韻組，1603個韻字，其中山西方言145個韻組515個韻字，山東方言44個韻組142個韻字，湘方言121個韻組355個韻字，閩方言78個韻組208個韻字，客家方言76個韻組216個韻字，贛方言43個韻組104個韻字，粵方言9個韻組27個韻字，吳方言14個韻組36個韻字。²¹ 其中粵、吳方言分析的韻組很少，是由於材料的限制。分析這些南方方言主要是想考察一下入聲韻押韻的情況，因為北方的十三轍不涉及這個問題，將粵、吳方言與其他有入聲的方言合在一起，總量也不算少，可以說明問題了。

上文通過對十三轍的考察，我們的結論是：凡是在一起押韻的字，其主元音和韻尾基本都是相同的。參照當代民謠用韻分析的結果，我們需要對上述結論做出修正，即：凡是在一起押韻的字，絕大多數情況下，其主元音和韻尾都是相同的。此外還有主元音相同，韻尾不同押韻的情況，也有韻尾相同，主元音相近押韻的情況，但是沒有主元音和韻尾都不同而押韻的情況。

主元音相近，韻尾相同而押韻的例子佔總韻組和總韻字的3%和2%，下面就是一些例子，其中又分兩種情況：

19 何佩森：《梨園聲韻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253。

20 段寶林、過偉：《民間詩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第一種情況，從音位角度考慮，實際上主元音是相同的，如(略去了調號)：

Λ 與 a:

胖娃娃，甬哭啦，擦干眼淚上車哇。誰趕車 tshΛ？你二哥 ka。誰買票？你二嫂。²²

ə 與 uo:

買下驢，不會套，嗔著女婿不買整。買下整，不會鰓 pə，嗔著女婿不買鍋 kuo。買下鍋，不會做，嗔著女婿不打醋。²³

in 與 ən:

王小二，看水牛，水牛過澗，踩死螞蟥，螞蟥告狀，告哩和尚，和尚念經 tcin，念哩先生 sən，先生打卦，打哩姐姐，姐姐繡花，繡只糍粑。²⁴

罵你娘不是人 zən，把兒丟在苦竹坪 bin。要柴燒，坡又高，要水吃，水又深。打溼羅裙不要緊 tcin，打溼花鞋千萬針 tsən。²⁵

正月裏來是新春，正月裏來是新春，家家戶戶點紅燈 tən，人家新年紅燈點，我家門前冷清凈 tchin。²⁶

in 與 əŋ:

雞雞翎 lin，開馬城 tsəŋ，馬城開，要哪外(誰)，要我原人回來。²⁷

Λ 與 a 完全可以歸併成一個音位 a，因為該方言中並沒有 Λ 與 a 的對立。uo 本來就可以記作 uɤ 或 uə，只是在 u 后便習慣上記成圓唇圓音罷了。in 和 in 也可以記成有央元音過渡的形式，即 iən 和 iəŋ。所以上面這幾例主元音是記錄符號上的差別，從音位角度考慮，主元音是一致的。

第二種情況，即主元音不同，如：

ɿ ʅ ɪ ʝ i 押韻：

說七配七，七對鴨子八對雞。說八配八，八打蓮花。說九配九，紅絲帶子綠絲狗。說十配十 sɿ，十字路口插紅旗 tchi。²⁸

21 具體材料參看本文附錄。

22 謝自立：《天鎮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年，頁65。

23 蔡權：《吉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年，頁67-68。

24 儲澤祥：《邵陽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201-202。

25 李啟群：《吉首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350。

26 李啟群：《吉首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352。

27 吳建生，李改祥：《永濟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年，頁62-63。

28 吳建生，李改祥：《永濟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年，頁62-63。

29 馬鳳如：《金鄉方言志》，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頁201。

氏牛拉磨，變個饅饅，饅饅生吃 tshɿ，變個公雞 tci。²⁹

吃飽飯肚裏不飢 tsɿ，往東走腿肚朝西 sɿ，初一到十三，半月少兩天 thɿ。³⁰

uŋ 與 yŋ：

饅饅生吃，變個公雞，公雞打鳴兒，變個豆蟲 tshuŋ，豆蟲一咕登 yŋ。³¹

an 與 ien：

魚頭魚尾都食開，中間拿來娶新娘。娶介新娘高天天 thien，煮茶煮飯臭火煙 zan。³²

主元音相同而韻尾不同押韻的例子佔總韻組和總韻字的 0.4% 和 0.2%，如：

-ʔ 與 -k：

挨墓碑婦，割雞作餽請阿舅舅。阿舅唔來食 tsiaʔ，二人相磕撇 phiak。³³

-t 與 -p：

二十五六，買魚斫肉，二十七八 pat，沙雞殺鴨 ŋap。³⁴

這種主元音相近、韻尾相同押韻和主元音相同而韻尾不同押韻的例子正類似於《詩經》用韻中的合韻或陰、陽、入聲韻通押的情況，而且就所佔比例來說，也與合韻、通押相似。

四

本文中，我們考察了十三轍和當代民謠用韻的情況，分析的結果是：凡是在一起押韻的字，絕大多數情況下，其主元音和韻尾都是相同的。主元音和韻尾都不同不能押韻。所以，我們就可以說，那種使得《詩經》中一起押韻的字主元音和韻尾都不相同的構擬是不合適的。但是，民謠用韻中也有韻尾相同，主元音相近押韻的情況，那麼，我們為《詩經》的韻部擬音時，是否要堅持一個韻部一個主元音的原則呢？上面的分析使我們確信，主元音和韻尾都相同是押韻現象的總體特徵，是「常例」，韻尾相同，主元音相近押韻的情況是「變例」，自然，我們應該根據「常例」為《詩經》的韻部擬音，即堅持一個韻部一個主元音的原則。薛鳳生先生在討論《中原音韻》韻部時，對押韻現象有非常精辟的為論述，我們就引用薛先生的話結束本文的討論，薛先生說：「我認為，押韻現象高度地揭示了本族語使用者對其本族語言獨特的音位結構的感覺，因此一種語言的充分地音

30 張振鐸：《沁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年，頁52。

31 馬鳳如：《金鄉方言志》，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頁201。

32 王李英：《增城方言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428。

33 羅志海：《海丰方言》，德宏民族出版社，1995年，頁120。

34 謝留文：《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57。

35 薛鳳生著、魯國堯、侍建國譯：《中原音韻音位系統》，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年，頁78。

位分析必須能給說本族語的人的押韻實踐清楚地展示其音韻上的道理。一般都同意，只有當漢字具有相同的主元音和相同的韻尾(如果有的話)的時候，它們才能押韻。」³⁵

附錄：

下面是本文討論當代民謠用韻時參考的方言材料：

山西方言：蔡權1990《吉縣方言志》，江蔭禔1991《朔縣方言志》，李小平1991《臨縣方言志》，劉毅、張振鐸1991《屯留方言志》，呂枕甲1991《運城方言志》，潘耀武1990《清徐方言志》，喬全生1990《汾西方言志》，史素芬、李奇1990《武鄉方言志》，宋欣橋1991《孟縣方言志》，王希哲1991《左權方言志》，吳建生、李改祥1990《永濟方言志》，謝自立1990《天鎮方言志》，楊增武1990《山陰方言志》，張益梅1991《介休方言志》，張振鐸1990《沁縣方言志》，朱耀龍1990《新絳方言志》，以上出版社均為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山東方言：羅福騰1992《牟平方言志》，語文出版社。馬鳳如2000《金鄉方言志》，齊魯書社。錢曾怡、羅福騰1992《濰坊方言志》，濰坊市新聞出版局出版。石明遠1995《莒縣方言志》，語文出版社。于克仁1992《平度方言志》，語文出版社。趙日新、沈明、扈長舉1991《即墨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湘方言：儲澤祥1998《邵陽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崔振華1998《益陽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李啟群2002《吉首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羅昕如1998《新化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閩方言：林連通1993《泉州市方言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林連通、陳章太1989《永春方言志》，語文出版社。廈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6《廈門方言志》，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張振興1992《漳平方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周長楫、周清海2000《新加坡閩南話概說》，廈門大學出版社。

客家方言：王李英1998《增城方言志》，廣東人民出版社。謝留文2003《客家方言語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謝永昌1994《梅縣客家方言志》，暨南大學出版社。

贛方言：吳啟主1998《常寧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粵方言：詹伯慧、張日昇1998《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暨南大學出版。

吳方言：浙江省桐廬縣縣誌編纂委員會1992《桐廬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本文屬專著類】